

● 海洋出版社

中国精神丛书

求知篇

蔡晓云 洪希刚 编著



中国精神丛书编委会

主 编：冯 肃 林 翰 丁 一

副 主 编：朱立群 张景岩 边东子

廖胜辉

编 委：丰 力 张日培 莫贤堂

徐国宝 曾 平 董士朴

蔡晓云 魏冬生 魏 敏

目 录

引言：知识就是力量	(1)
一、求知需要毅力	(7)
二、求知应该勤奋	(20)
三、学习知识要广博	(34)
四、学习传统文化的精华	(46)
五、要创造性地学习	(54)
六、实践出真知	(68)
七、自学能成才	(85)
八、身残志不残	(103)
九、在逆境中求知	(115)
十、求知要讲究方法	(131)
后记	(144)

引言：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透辟的论断，出自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之口，流传至今已有数百年。当时他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对人的束缚，主张“要象世界的本来面目”那样认识自然。他认为只有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才能征服自然，主宰自然。几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但这句名言象永不褪色的旗帜，一直启迪并激励着人们去探求科学知识，去探求真理。

知识大体可分为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两大类。人类在征服大自然的斗争中，在从事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和积累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从而进一步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知识是人类争取自由的有力武器。掌握了知识的人们才能逐步摆脱蒙昧状态，逐渐走向文明。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终于先后实现了蒸汽机和电力的应用所引发的两次技术革命。到了20世纪，人们又进入了以原子能利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时代。高度先进的科学技术、各种关于自然科学的新知识、新发现、新创造层出不穷，使人类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如虎添翼。

人类在变革社会的斗争实践中，也在不断总结经验，创造、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这些知识、经验上升到理论，反过来又在更高的层次上成为人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并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从而推动社会历史的车轮不断滚滚向前。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前人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创立的学说，也属于社会科学知识的范畴。这一先进的理论，一经掌握了群众，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帮助无产阶级挣脱旧社会的锁链，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形态，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带来了曙光。

正因为知识具有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所以它吸引着从古到今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志士仁人，愿意付出毕生的精力，去追求它、掌握它。

在历史上曾创造过灿烂辉煌的文明的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逐渐落伍，沦为任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面对国势日衰、生机萎缩的局面，中国的先进分子纷纷向西方寻求科学知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谛和富国强民的道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革命派代表人物何香凝的事迹十分感人。她在少女时代就十分好学，后来和廖仲恺结为伉俪，思想和学习都得到很大的帮助。他们渴望去日本求学，希望在救国图存方面有所作为。当留学的愿望因经费困难而无法实现时，何香凝不顾家庭的阻拦，毅然变卖了自己的妆奁和全部家私，加上私蓄，凑足路费，和廖仲恺先后跨海东渡，踏上求知、救国的革命征途。

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李大钊，在少年时代就矢志努力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面对着袁世凯复辟所造成的“危机万状”的局面，苦心焦虑，期望找到一条出路。1913年冬，李大钊东渡日本，考进了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他经常和留学

生们议论国是，探讨对宇宙、人生的看法，而且读了不少介绍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当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以极大的热情，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大地上传播这革命的火种。

继李大钊之后，我国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热血青年，也走出国门，到日本，到欧洲去留学。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推动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当年19岁的周恩来在赴日本求学前夕写下的一首诗，正抒发了这些有为青年为拯救祖国外出求知的壮志豪情：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随着长期封闭的国门被打开，西方的各种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在科学与民主口号的启发下，许多有识之士看到了知识的力量，而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教育，于是产生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想法。他们热心兴学办校，教书育人，大力传播知识，开发民智，以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实现振兴中华的崇高心愿。著名的教育家马相伯认为，“育人才”是“自强之道”，他毅然毁家兴学，变卖全部家产，先后创办了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了全部的心力。现代知识界的卓越前驱蔡元培，为中国培育了无数优秀人才。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为提倡普及教育，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他是通过刻苦自学取得学识的。由于目睹国家孱弱、人民贫穷、缺乏文化的状况，他痛感“教育

为立国之本”，于是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奉献了自己的大部分资产，用来兴办教育事业，为千千万万青少年创造了学习求知的条件。那一幢幢宏大的校舍，寄托着这位杰出的爱国侨领盼望中华民族强盛的崇高理想和殷切深情。

在“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旧中国，无数先进分子，披荆斩棘，四处求知，探寻救国拯民之路；无数仁人君子，筚路蓝缕，兴办教育，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他们不啻希腊神话中盗取天火、为人间带来光明的普罗米修斯。他们的不朽业绩，将永垂青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文化知识，创造了空前的有利条件。人民翻身解放，引发出一个强烈、广泛的求知热潮，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扫盲运动。为了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需要有人才，需要借助知识的力量。过去没有机会进正规学校学习的工农青年和工农干部，走进了“工农速成中学”，他们中的佼佼者如郝建秀、高玉宝等，又接着升入大学深造；相当数量的优秀学生、科技人员被派往苏联、东欧留学，学习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国内各级各类学校，有很大发展，各种人才迅速培养成长起来。

由于全中国人民的忘我劳动，也由于建国以后从上到下重视学习求知，劳动者的思想觉悟、文化素质提高很快，这就使得年轻的共和国得以迅速地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整个中华大地，工农百业振兴，国民经济增长，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提高，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新气象。中国人民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

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我们的祖国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知识的力量是巨大的。知识，以及人们对知识的态度如何，直接影响着并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平。所以，在“四人帮”覆灭后，在百事待兴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刚一恢复工作，首先抓的就是科技和教育。他最关心的，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人才。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指出：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他大声疾呼：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斩钉截铁地表示：“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在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全国科学大会上，他又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并提出要建设一支世界第一流的、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的问题。这一系列论述，发表在10年动乱刚刚结束的年代，实在是震聋发聩！它把被搞乱了的思想重新端正过来，有力地促进了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复苏和发展。涂在知识这个字眼上的污垢，总算被冲刷掉了；知识又重新闪射出耀眼的光芒，它召唤着、吸引着饥渴已久的人们，去追寻它、拥有它。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大地上再一次兴起了求知的浪潮。

在过去的10年里，知识象插上了翅膀：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他们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处不显示出知识的巨

大力量。单是科技方面，就创造了重大成果11万多项：许多成果表明，我们在一些研究领域，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当然，同我们宏伟的目标相比，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差距还是太大了。

我们还要努力！我们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

我国5亿多青少年是跨世纪的一代，是祖国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青年一代的思想状况和知识水平。今后的10年，我们要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为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富强。广大青少年要象先辈那样，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为使中华腾飞而不断求知、刻苦求知，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努力把自己造就成祖国所需要的人才，在今后的10年中，在21世纪的历史舞台上，创造出比前辈更加辉煌的业绩！

一、求知需要毅力

求知的道路，不可能总是笔直宽阔、一马平川，倒常常是布满荆棘、狭窄陡峭；求知的征程，不可能总是风和日丽、鸟语花香，有时也会雷鸣电闪、毒雾弥漫。有志求知的青少年，只有勇敢地披荆棘、攀险路、冲雷电、拨迷雾，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目的。这种战胜艰难险阻的坚强意志和力量，就是毅力。

毅力来自崇高的理想和抱负，它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人们有了正确的求知目的之后，不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无往而不胜。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只读过初中，青年时期家里一贫如洗，他自己又被一场几乎夺去生命的伤寒症弄成了残疾。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了自学。1936年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时，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哈代曾建议他只学一两门学科，这样两年即可获得博士学位。年青的华罗庚拒绝了这一建议，甘愿“自讨苦吃”，坚持同时攻读七八个学科。尽管这样做有可能失去博士头衔，而且困难重重，但他却毅然选择了艰难的道路，宁可多学一些真知和本领，而不在乎个人的名誉地位。华罗庚终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被誉为“剑桥的光荣”。他用行动验证了自己的正确选择。

毅力的特征是勇气和坚韧。在求知过程中，不但要勇于迎接困难的挑战，而且还要能够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放手。山西的农民科学家吴吉昌，牢记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努力探索棉花增产的技术。“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棍打、火烧，血流满面，昏迷不醒，腿部受伤，左臂五次被踩得脱臼落下残疾。但他仍千方百计地坚持搞科学实验，终于研究出10多项种植棉花的新技术。这种超凡的毅力，是吴吉昌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众多成功者的切身经历，都充分说明，毅力是一种极可贵的品格。如果缺乏毅力，在求知过程中，一有难题，一遇挫折，一遭磨难，就灰心丧气、打退堂鼓，那不但学不着技术，求不到真知，最终将一事无成。所以，缺乏毅力，对一个人来说，是莫大的缺憾。一切求知的朋友们，都应注意培养和锻炼自己的毅力，学习鲁迅先生的“韧”劲：“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使自己具有顽强的毅力，成为顶天立地的强者。

云程有路志是梯。高尚、美好的志向所激发出来的毅力，能使一个平凡的人变得聪明、勇敢、无坚不摧。一座座科学技术“堡垒”的攻克，一个个不平凡业绩的创造，都揭示着一个真理——最终起作用的不是生就的天才，更不是幸运的机遇，而是坚强的毅力。理想——毅力，是求知路上攻城夺隘必不可少的云梯。

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山西省劳动模范康福存，是位普通的农村青年。他的家乡晋西北黄土高原上的神池县，是山西出名的穷县。为了改变家乡的穷困面貌，结束乡亲们1年只能吃上3两油的历史，康福存决心培育胡麻良种，使素有“胡麻之乡”美称的神池农村，重新焕发光彩。经过7年的辛勤

工作，康福存以非凡的毅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培育良种，对康福存这个只念过一年初中、文化水平不高、生产经验不足的年轻人说来，完全是个未知的领域，是个不小的难题。要培育胡麻良种，首先要懂得胡麻的育种知识。他去县书店买这方面的书，没想到跑遍了周围3个县，都没能如愿。后来求助于县农业局技术推广站，才算学到了一些胡麻育种的基本方法。

开始育种了。他把从大同市雁北地区高寒农作物研究所要来的6种胡麻种子，种在试验小区里，象伺候婴儿那样，精心管理。胡麻开花时节，康福存整天守在地里，按照学来的办法，一株一株进行人工授粉。没想到第一次的工作全失败了。在一些人的冷言冷语面前，他没有泄气，继续整天泡在地里，细心观察胡麻开花的情况。困了，用井水浇浇头；饿了，吃几个山药蛋。他终于摸清了胡麻开花的规律，掌握了授粉的最好时机——上午10点多钟，这是胡麻开花最旺盛的时刻。就这样，他用自己的汗水和毅力，换来了第一代胡麻杂交后代，共900多粒种子。

为了掌握育种的全部知识，他克服文化水平不高的困难，硬是啃下了《作物遗传育种》、《农作物手册》以及几十本有关胡麻、玉米、小麦、马铃薯等育种知识的书籍，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学习笔记，从而大大充实了自己的头脑。

为了加快胡麻的繁殖，康福存得到允许，带着1.5公斤杂交种子，到了海南岛。他吃的是米饭拌豆瓣酱，住的是海边的草棚，睡到半夜，蛇会从顶棚上掉下来。白天下地干活，这里和黄土高原可不一样，气候又闷热又潮湿，稍一动手，汗水就象下雨似的，刚干上一会儿，心里就直翻腾，想呕吐。但

他克服了这一切困难，坚持了下来。利用海南岛的热带气候培育出的第四代杂交种子，赶上了家乡山西当年的播种季节。

整整4年的辛劳，康福存没有得到预期的良种，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嘲讽、埋怨，入党申请也得不到批准，劳动报酬又比别人低……他苦恼过，但没有动摇。他继续咬紧牙关，一年又一年地坚持试验下去。

1976年，这是中国人民经历巨大灾难和悲痛的一年，也是迎来巨大胜利和欢乐的一年。康福存经过7年辛苦，精心培育的胡麻，终于也出现了一个分蘖多、颗粒多、籽粒大又抗旱的好品种。经过专家鉴定，这的确是胡麻良种。它被取名为“东亚一号”，因为这是在康福存的家乡东湖培育出来的亚麻（即胡麻）良种。

“东亚一号”逐年推广开了。4年后，贫穷的神池县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奇迹：全县胡麻总产量达到1450多万公斤，有的地方人均分油多达300多斤。到处飘荡着麻油的香味，到处洋溢着农民的欢乐。乡亲们由衷感谢年轻的康福存，他为神池人找到了一条致富的道路。

象康福存这样不畏艰辛，凭着毅力顽强求知，最终实现理想的青年，各行各业中都有。

16岁参军入伍的洪其淮，在短短的几年间，成长为保卫祖国领空的优秀战士，他接连立功受奖，先后荣获标兵、新长征突击手、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24岁时就担任了闻名全军的英雄集体——“杜凤瑞大队”大队长职务。这一切，都来自他崇高的理想信念，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刻苦顽强的毅力。

洪其淮还在上小学时，老师就把空军英雄杜凤瑞的光辉形象，深深地刻印在他纯真的脑海中了。他是带着杜凤瑞画

册走上学习飞行的道路的。1978年，他从航校毕业时，又带着全优的成绩，被分配到杜凤瑞生前所在的航空兵某师。

飞行部队的训练，课目复杂，难度高，风险大，随时都可能流血捐躯。一次，部队发生了一起机毁人亡事故。在进行检查和安全整顿中，洪其淮再一次坚定了“怕死不飞行，飞行不怕死”的信念，并自觉地在飞行训练中磨练自己的意志，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有一次他驾驶的飞机发生了断电事故，这是从未遇到过的严重情况。一时间飞机仪表失灵，指示灯熄灭，操纵系统停滞，飞机成了断线的风筝。面对险情，洪其淮没有惊慌，没有恐惧，他沉着果断地采取应急措施，终于安全着陆。对这次特殊情况的处置，增长了他的智慧和经验。他钻研科学知识和飞行技术的劲头更足，求飞的心情更迫切了。

1980年3月，洪其淮被选拔为改装超音速歼击机的飞行员，这意味着飞行技术的升华。他以全副精力投入了新的训练。这年7月，改装训练进入高潮，飞行强度明显加大。他除了完成规定的训练内容外，还给自己开“小灶”——在地面加练一些技术难度大的课目，而且自觉地严要求，一丝不苟。当时，南国的骄阳似火，手碰机翼都能烫起个水泡。而洪其淮却钻进了不透一丝风的狭小座仓里，进行模拟飞行，在40多摄氏度的高温蒸烤下，一练就是一个多小时。每次出仓时，脱下衣服拧出的汗水，滴在地上湿了一大片。他手臂、大腿上的痱子密密麻麻，看上去简直象“小米钢巴”，到睡觉时更是刺痒刺痛，连身都不敢翻。但这一切困难，却被他顽强的毅力战胜了。他取得了改装飞行全部五分的“满堂红”成绩，荣立了三等功。

在这一年里，他还苦学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苦练飞行射

击技术，拿下了一个个又一个的课目。为了练出“首炮命中”的功夫，他把自己制作的小靶标挂在蚊帐杆上，小树枝上，然后拿着飞机模型，一遍又一遍地从不同的角度琢磨进攻的要领。为了练习打中地靶，他在楼梯口的地板上画上目标，然后拿着模型飞机，从楼梯上俯冲而下。一次次地爬上爬下，一遍遍弯腰弓背，不知流了多少汗水……终于，在24岁生日那天，洪其淮完成了飞行大纲规定的全部课目，成为一名4种气候条件下，都能飞行的“全天候”飞行员，成为有着钢铁翅膀的战鹰。

也许你缺乏学习的有利条件，基础不好，环境又差；也许你很幸运，天生聪慧，一帆风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无论你的情况如何，当你决心扣击知识殿堂大门时，当你继续在学问的海洋中扬帆远航时，你都应当有克服各种困难的精神准备。学海无涯勤是岸，毅力与勤奋，正是解决一切困难的“万能钥匙”，是达到胜利彼岸的“诺亚方舟”。

降边嘉措，这个贫困西藏农民的后代，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小战士，成长为藏族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身上具有一种能吃苦耐劳的“牦牛精神”，一种向着高峰攀登的顽强毅力。

1950年，11岁的降边嘉措成了挺进拉萨的解放大军中的一名文工团员。两年后他进了拉萨的西藏军区干部学校，开始学习文化。当时想在拉萨找到一本可读的书是很困难的，他好不容易才借到一本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又因为文化水平低，许多字都不认识而看不懂。怎么办？他就把不认识的字写在手上或纸片上，向一些汉族学员请教。就这样，降边嘉措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读完了这本小说。书的边角

全都变成了圆的，就象真的被他“啃”过似的。小说中的牛大水、小梅、黑老蔡以及他们的战斗生活，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同时也引起了他的联想——如果能够把进军西藏、解放百万农奴的战斗经历写成一本书，那该多好啊！后来他到西南民族学院学习，又到北京民族出版社当藏文翻译，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之后，这个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为了回忆进军西藏的战斗生活，也为了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降边开始认真地写日记。他发挥从小就有“牦牛精神”，一天也不间断地写、写、写……从1958年开始，一直到1968年，共写了28本，190多万字的日记。那一页页日记上的行行字迹，不正是一个藏族青年艰辛跋涉、刻苦攀登文学高峰的足迹吗？

1960年春节期间一个深夜，降边嘉措在灯下摊开稿纸，郑重地用藏文和汉文写下了一个酝酿已久的书名《格桑梅朵》。3年之后，他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送去了25万字的小说初稿。那一年，他才23岁。

如同青藏高原上象征吉祥和幸福的格桑花饱经雨雪风霜一样，降边嘉措所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格桑梅朵》，整整经历了20年的风雨，经过反复锤炼，终于在1980年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辛勤的劳动，得到了应得的报偿。

文学翻译家朱生豪，是浙江嘉兴人，1912年出生。从小酷爱读书，中学时代就发表过作品，展露出他的文学才能。

1933年他在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上海世界书局聘为英文编辑。工作之余，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读书学习上，尤其喜欢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当时我国翻译莎士比亚剧作

的工作还没有充分展开，不仅译本数量少，而且译文艰涩难读。曾有外国人讥笑中国是个“没有文化的国家”，“连莎士比亚全集的译本都没有”。朱生豪听说后，受到强烈的震动，他决心集中精力把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翻译出来，使这位天才的戏剧家，能为中国广大读者所认识。

开始动手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时，朱生豪只有24岁。他除了白天要上班外，晚上的所有时间几乎都用来反复阅读、研究莎士比亚的原著，并找来各种不同的版本进行对照比较，以便使译文尽可能保持原作的神韵。1936年，他终于首次译出了《暴风雨》，接着又陆续翻译了《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等。到1937年夏天，他已译出了9个剧本。谁料到，“八·一三”日本侵略者燃起的战火蔓延到上海，朱生豪历年潜心收藏的各种有关资料及参考书籍，都在战火中毁于一旦，连已经定稿的译文也未能幸免。但这惨重的损失，并没有使他沮丧，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

1942年，他回到故乡嘉兴，闭门不出，以顽强的毅力，重新开始他的翻译工作。他专心致志，整日埋头于书案，每译完一段就反复朗读，推敲斟酌译文是否上口，意义上是否贴切，音节上是否和谐。他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伟大的工作中，达到了乐而忘忧的境地。

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44年，他已经译出了莎士比亚的全部悲剧、喜剧以及部分历史剧，总共有31部之多。其中9部是完全重新翻译的，可以想象得出，他花费了多少艰辛劳动和汗水。由于身体虚弱加上过度辛劳，朱生豪终于卧床不起。1944年12月26日，他不幸去世，终年只有32岁。

朱生豪短短的一生是勤奋学习的一生，是顽强拼搏的一